

20世纪

汉语新诗语言研究

陈爱中◎著

The language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poetry in 20th century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世纪

汉语新诗语言研究

陈爱中◎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陈爱中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01-012443-8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7976 号

20 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

20 SHIJI HANYU XINSHI YUYAN YANJIU

陈爱中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53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2443-8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一等资助金项目

(编号为20080430176) 出版资助

系黑龙江省首届省属本科高校战略后备人才出国研修资助项目成果

目 录

序.....	王尧 1
--------	------

导论 汉语新诗：从语言到话语.....	5
---------------------	---

上 编

第一章 汉语新诗的语言表述空间	15
-----------------------	----

第一节 从意会到实证.....	15
-----------------	----

第二节 从片段到整体.....	18
-----------------	----

第三节 从定则到自由	26
------------------	----

第二章 现代实证思维对汉语新诗语言的影响	31
----------------------------	----

第一节 现代实证思维：现代汉语的思维力量	31
----------------------------	----

第二节	散文语言：汉语新诗语言的内在架构	37
第三节	回归的可能：言说他者的宿命	50
第三章	翻译与汉语新诗命名	61
第一节	他山之石：翻译的意义	62
第二节	迷失先兆：借鉴的危机	66
第三节	被取代的诗篇：非本体的叙述	69
第四节	结语	74
第四章	认同意识与汉语新诗	77
第一节	历史的伏笔：主动放弃的主体性建构	78
第二节	“我应该是谁”还是“我是谁”：分裂的诗学认同	81
第三节	可能性的选择：文体的迷津	84
第五章	现代视野下的古典面影	89
	——重述汉语新诗格律建设的困境	
第一节	破坏：解构的可能	91
第二节	重构：古典的焦虑	92
第三节	源头：语言习得方式的改变	99

下 编

第六章	以旧的姿态矗立	109
	——重读《尝试集》	
第一节	多声部的诗学：“《尝试集》群落”概念的提出	110
第二节	守旧的中间态：白话诗与《尝试集》	113
第三节	域外与传统：《尝试集》的文本虚像	120
第四节	结语	125

第七章 格律与自由的恰切糅合

——试论新月诗歌的语言表述 129

第一节 语言言说：迷途后的归乡 129

第二节 琴瑟和谐：格律与自由糅合下的规律化诗学 132

第三节 承上启下：新月诗歌的语言价值估衡 139

第八章 迷失的风景

——1949—1979年汉语新诗综论 143

第一节 体制化：创作机制的更迭 143

第二节 消费模式的重塑 153

第三节 表述结构的重组 155

第四节 结语 159

第九章 朦胧诗一个需要继续重述的诗学概念 163

第一节 表述他者的媒介：“崛起”论视野中的朦胧诗 164

第二节 懂与不懂：一个不具学理性的命名 169

第三节 泛泛而言：朦胧诗的时间问题 171

第四节 矛盾的文本：朦胧诗的诗学结构 177

第十章 激情泛化的诗：论第三代诗歌的青春化写作 197

第一节 宣泄的青春 199

第二节 行为的诗歌 207

第三节 结语 212

第十一章 重塑汉语新诗的语言镜像

——论杨炼的诗歌 215

第一节 诗语重塑：汉语新诗语言的重新认识 216

第二节 多声部诗学结构的呈现.....	224
第三节 被遗忘的诗学符号.....	234

第十二章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论杨炼的空间诗学.....	238
-----------------	-----

第一节 智力的空间.....	238
第二节 汉字字符的魅力.....	246
第三节 旁观者的诗学.....	248

第十三章 静默地谛视世界

——论张曙光的诗.....	252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52
第二节 “这一个”的诗学体验.....	254
第三节 疑问和反思的哲学对话.....	264

参考文献.....	272
-----------	-----

后 记.....	278
----------	-----

序

4月去大连开会,见到罗振亚教授,不约而同说到远在荷兰莱顿大学访学的陈爱中。爱中师从罗振亚教授专治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从北国到江南,在苏州大学跟随我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爱中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出版后受到同仁的关注,我也是由这本书开始了解他的研究特质和路向的。印象之中,2007年爱中是带着这本书进站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写过一些革命的、抒情的朗诵诗,也写过几首儿歌,内容几乎都忘记了,只记得当年情绪高昂。前几年偶然有诗兴,也涂过几首,但未敢示人。文人骨子里大概都有写诗的愿望。在学术研究中,我一直觉得仅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史著作是偏颇的,应当兼顾到诗文。散文研究的冷落不必说,新诗的研究也被置于次要位置。所以,我一直对那些长期坚持诗歌研究的同仁怀有敬意。就自己的学术历程而言,八十年代初期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对我的诗学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九十年代末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永远的诗——关于谢冕的几个侧面印象》,以表达我对诗评家谢冕先生的敬意。

爱中申请进站时提出,在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的基础

上,将研究对象延伸到当代汉语新诗,集中讨论当代汉语新诗的语言生成机制问题。这不是我熟悉的领域,但我意识到爱中提出的这一问题有重要价值,如果能将“现代”与“当代”的“汉语新诗”在“语言”层面上打通,不仅对汉语新诗,对整个新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尽管我们是两代学人,但在文学研究中都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在讨论一些问题仍然有“共同语言”。爱中对诗歌的理解也有所纠正了我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偏颇,教学相长,此之谓也。经过两年的研究和写作,爱中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报告《中国当代新诗语言生成机制研究》。现在我们读到的爱中新著《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就是在此研究报告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爱中研究汉语新诗的特点,便是“中国新诗的一种语言学阐释”,他把这样的学术路径视为“回归故乡”,试图在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上讨论汉语新诗的语言问题。这样一种情绪的学术路径和“回归故乡”的学术抱负,贯穿着爱中汉语新诗语言研究的全过程。从《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到《中国当代新诗语言生成机制研究》再到《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爱中在汉语新诗研究领域的特色越来越清晰而且逐渐具有了个人的学术特征。尽管还不能说,爱中的这些成果促进了汉语新诗研究的转型,但毋庸置疑的是,爱中研究汉语新诗语言的理论、观点、方法和相关成果为汉语新诗研究打开了另一条通道。

正像爱中意识到的那样:任何一种阐释体系的逻辑起点都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是“绝对正确”的,任何一个逻辑起点所引致的较为合理的阐释体系必然是“局部的真理”,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走“偏锋”是其必然命运。以如此理性的观察视角,这决定了爱中在他的研究中既尊重、承继了汉语新诗研究的既有成果,又深入反省了建构汉语新诗阐释理论的逻辑起点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在提出自己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阐释之前,爱中批判了汉语新诗研究中的“政治话语”和以域外诗歌理论为中心的他者意识所形成的狭隘对立思维,显示了他对汉语新诗研究史的准确而深刻的把握。这样的清理和批判,为爱中试图参与为汉语新诗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阐释体系创造了条件。就学术的传承而言,爱中对两种“绝对正确”的话语理论的反省,亦是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

的一个部分。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新诗,其实也是汉语新诗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八十年代以后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对“语言”的理解,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的转换。无论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还是西方语言哲学的重新阐释都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已经由先前的“表述工具”论和单纯的形式论走向了本体论和价值论,超越了语言仅为媒介而且表意透明的“幼稚”想法,将语言作为思想的家园和目的。这种走向必然会带来文本阐释的系列重组。——这是我们今天已经形成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影响之下,爱中明了“语言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认识对于诗歌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传统汉语诗歌还是西方的诗歌传统,都是通过外在或内在的语言尺度来界定和分析诗歌的”。他由此在反思汉语新诗阐释现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诗歌语言的层面上,从而探讨并呈现了重新阐释汉语新诗文本的理论可能。以我的理解,爱中在许多方面,都对汉语新诗的语言问题做了创造性的阐释,比如:从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的文体意识的关系;从传统诗学的视角对汉语新诗格律困境问题的重述;从现代实证思维的元素来检视汉语新诗语言的构成;从时间维度考量汉语新诗语言的发展轨迹;从译介的视野来论述汉语新诗命名的异质性;以及在诗学概念上对“朦胧诗”的重述,等等。

爱中对这一学术工作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和期望期许,他觉得以诗歌语言作为切入视角是一个老而弥新的选择:之所以“老”,是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谈及汉语新诗的何种问题,总是难以回避语言的思考,而且已经有很多学者或多或少地涉及过这个层面的问题,产生过诸多的争论。之所以“新”,是缘于在对语言认识的观念实现转化之后,至今为止对之尚未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讨论。爱中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克服以下的问题:“新视阈所带来的诸多重述尚未得到有力的辨析,许多看似定论的结论尚未得到深切地反思,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依然是诸多的学者和现代诗人感到困惑的核心命题。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仍然没有从意识的深层摆脱传统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视角,并没有真正确立诗歌语言的本体论意识,从内容出发仍然是中国新诗阐释的居于主流的阐释视角选择。”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学术

任务,也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但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对爱中始终是一种召唤。

显然,《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深化了他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以话语语言学为切入点,试图来重构20世纪汉语新诗的语言格局。比如他对杨炼诗学理论的书写。对于汉语新诗而言,杨炼以其独特的历史性、现场性和间离性,他的诗歌创作对于汉语新诗有着独特的意义。爱中从文学空间理论来关注杨炼诗歌的空间诗学,从汉语字符的本体化角度来阐释杨炼的诗歌,从文本细度到理论阐释,等等,都是一个扎实的贡献。

爱中于2010年5月以优秀的成绩出站。在发展之中,爱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怀有深厚的忧患意识,孜孜以求的是重构知识背景、深化研究领域和拓展学术空间。于是有了去欧美大学访问的计划,最终落实到了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莱顿大学。我曾经访问过这所大学,和爱中的指导老师柯雷教授有一面之缘。莱顿大学和莱顿小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中到达以后,我建议他除了学术之外,应当好好享受欧洲小镇的风情。当他后来告诉我新著《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即将出版时,我想他还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学术上。

在新作付梓时,爱中多次写邮件来希望作序。爱中温和、敦厚,善解人意,很少麻烦我什么事,我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回绝。但这学期特别忙碌,短短的序言拖延了很长时间,深感歉意。我愿意和研究诗歌的朋友一起分享爱中的新成果,因而言了一些自己对爱中新诗研究的想法。

王 尧

2013年初夏于苏州三槐堂

导论 汉语新诗：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研究已经成为汉语新诗研究的核心域块，从被放逐于工具形式的尴尬，到跃出水面，在短暂的时间内成为研究的重镇，再到今天颇有研究拥挤之感的“过度”繁荣，汉语新诗的语言问题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硕果累累。在目前的研究视域内，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应该是主导，语言和言语、能指与所指，这些概念曾经为汉语新诗的语言研究提供了诸多新鲜的研究视角，充分的理论依据，它非常适合理性主义主导下的“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本质主义研究思路。从汉语新诗的种种具象出发，经过归纳和总结之后的抽象化过程，寻找某个诗歌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结构模式，这是一种现代认识论的思维程式。结构主义的研究优势在于，通过这种分析和把握可以迅速的感触到汉语新诗的某些实质，理清其发展脉络，客观知识的呈现颇为丰沛。但这种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这就是它依然是一种静态的、抽象化的研究方法，将汉语新诗的语言状态视为客观不可变迁的静态对象来展开构图，将传统语言概念作为逻辑起点，立足于音韵、节奏、意象等传统研究节点，来建立评价体系。在突破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二元研究格局之后，赋予汉语新诗语言形式以本体的意义，视其为内容的一部分，从而消弭掉汉语新诗将语言研究作为附从地位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应该说,目前的汉语新诗语言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此一历史使命。因此,本书的着力点不再过多的着意于此。

记得哲学家李泽厚在新世纪初从文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角度说,“有些所谓后学,玩语言嘛,文本就是一切,对现实生活呢,并没多大影响。中国玩语言,现在我觉得太过奢侈了。”^①当然,这里显然是宽泛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汉语新诗来说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语言研究,往往也是集中体现在汉语新诗上,因此说,他的这段话却也是映衬出汉语新诗语言研究的某些薄弱之处,这就是太顾及、太囿于小圈子内的“喧嚣”,学术在追求纯粹性的同时,势必容易流于孤立和自言自语。近几年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研究者们开始逐步修补这些传统做法的局限,尝试运用话语语言学的方法来重新打量汉语新诗的语言问题。所谓话语语言学,是“同逻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等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②的语言学研究,是一个相对松散的语言研究体系,“话语是言语交际单位,是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的完整性的书面语或口语成品(也有人将口语排除在外)。小至电文、便条,大至长篇多卷巨著,都可理解为‘话语’。重要的是,话语不是语言体系的表现,而是体系运用的表现。”“总起来说,话语语言学主要研究话语在交际过程中表现出的整体性特点,包括话语的形式语法特点,话语的结构模式和构成法则,不同话语单位的结构和区分,话语类型和话语的语体变体,话语交际中的各种语义特点,话语生成和接受过程汇总表现出的语用特点,等等。”^③20世纪初的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休斯创立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提出了能够突破传统语法理论体系的句法分析理论,强调语境对语句意义表达的决定性意义。随着苏联哲学家巴赫金的出现,话语语言学的研究臻至巅峰。他在集中写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著作,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超语言学”概念,也就是“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无论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但研究的方面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④并进而阐释说,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对话交际的‘篇章’

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⑤这是他在综合研究了之前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的语言学理论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后，在深入剖析这些语言理论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所做的超越性研究。显然，作为一种语言学研究方向，“超语言学”跳出了传统的语言学概念范畴和逻辑言说体系，试图再次回到语言产生的本源，从意识形态与符号、符号与语言等术语关系中重新建构语言阐释的构架。

巴赫金曾提出“话语”的概念，所谓话语：“不只是最典型的和纯粹的符号，除此以外，话语还是普遍适应性的符号。所有的其他符号材料在意识形态创作的一些个别领域都被专门化了。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材料，形成自己的，在其他领域无法运用的专门化符号与象征。这里符号是由专门的意识形态作用创造的，并无法与它分离。而话语却是普遍适用于专门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它可以承担任何的意识形态功能：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⑥“超语言学”和“话语”两个概念集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念，将语言视为一种动态的、交际的、互文的、开放的符号系统。“历时”的而非“共时”的空间观念将语言视为变动不拘的表述对象，无论是文本的互涉还是语境的更迭都是在变化中影响和成就着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

因此，本书所关注的，将是在这样一种语言观念下的 20 世纪汉语新诗的语言问题。

全书分两编，第一编主要侧重于宏观视野下的综合研究，从现代汉语为汉语新诗提供的语言表述空间、语言思维与汉语新诗的关系、从命名角度审视西方诗歌对汉语新诗的影响，汉语新诗的认同危机，以及从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度上考察汉语新诗在格律建构上面临的困境。

自诞生以来，汉语新诗所呈现出的语言状态，追根究底是由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来决定的。因此，第一章主要探讨的就是现代汉语的实证性和逻辑化的语言表述方式，在为汉语新诗摆脱传统汉语诗歌表述形式的同时，提供了新鲜的表述空间，比如对诗歌“表述个体性的侧重”、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多样化等。和第一章相适应，第二章主要是深入发掘现代实证思

维对汉语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汉语新诗表述形式的影响。这两章的着力点就在于将现代汉语的语言构成作为汉语新诗语言表述现象的内在资源,从而将汉语新诗的语言问题引向思维问题,一个同汉语文学的现代化息息相关的思维变迁历程上,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打量汉语新诗的萌生和建构命题。

第三章则是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新诗表述体系的建构的。如果说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的是汉语新诗语言如何呈现的话,那么这一章则是要讨论如何说出汉语新诗语言的呈现的问题,当然寥寥数语不可能说的很全面,只是选择从汉语新诗命名的角度来说的,力争做到窥一斑而见全豹。西方诗歌的文本和理论组成的话语的翻译直接影响到汉语新诗的文本语言和批评语言的建构,这种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这也直接造成汉语新诗至今无法完善的建立独立的阐释话语体系和文本表现体系。因此本章重点论述的就是汉语新诗命名的异质性问题。从翻译现象和命名机制的形成机理等角度来论述,尤其重点论述的是这种命名机制给汉语新诗带来的各种危机。比如“自由诗”的误读,比如“小诗”的翻译资源,比如现代媒介对汉语新诗命名的侵入,十七年诗歌对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诗歌”的曲解,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汉语新诗基本概念的重新梳理。不同语言形态下的诗歌文本和诗歌理念,因为语言形态的迥异和诗歌本身的不可翻译性,决定了汉语新诗不能长期沿袭翻译机制下的命名思路,而应该重新回归自身,回归现代汉语的本土,重新建构阐释话语,这也是后来王光明教授提出“现代汉语诗歌”概念的现实基础。

正是因为汉语新诗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冲突,缺陷和危机,长期以来,汉语新诗就缺乏正面的自我认同感。因此,第四章谈到的话题就是汉语新诗的认同危机。从汉语新诗初期的“非诗化”的启蒙功利选择开始论起,谈及汉语新诗从整体上放弃了“主体性”建构,从高度自觉的理论建构和现实诗歌文本的巨大差异出发,探求汉语新诗呈现出的分裂性的认同观念,以及文体意识的迷途,等等。虽然,依然采取的是负面的、否定性的论述方式,但无论如何,还是综述和阐释出了汉语新诗内在的身份焦虑问题。

认识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最后往往要归结于它的文体样式,无论是小

说、戏剧还是散文，文体的成熟与否是判定一种文学形式繁荣与否的重要指标。在这个层面上，汉语新诗是窘迫的，长期纠缠于“自由诗”与“格律诗”的二元概念中，甚至因此还曾经举办过全国性的讨论会，收效自然甚微。当人们知晓自由诗在文体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后，按照中外诗歌传统的惯势，总是力图建构汉语新诗的格律形式，但百年的探索并没有实现理想的预期，这其中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不能忽视的应该是建构模式的精神取向问题。因此，在第五章，就着重从语言选择的精神向度上探讨了汉语新诗格律的困境。汉语新诗在萌生之初，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之后，本来可以卸下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但新月诗歌的格律建构给它重新扛起了“古典”的重担。试图按照古典诗歌的格律内涵来营构汉语新诗的格律规范，无论是新月的“三美”还是田间的“新七言体”，何其芳的“顿诗体”，郭小川的“新辞赋体”，李季的“新鼓词体”，甚至包括西方的十四行诗，等等，都是殊途同归。从古典汉语到现代汉语，汉语习得方式的变迁，以及语言组织方式的更迭，都决定了汉语新诗必须从精神向度上抛弃掉中外传统诗歌的格律精神，从技法上而非从价值观念上来塑造汉语新诗的文体形式。

有了宏观的叙述，理论体系的搭建，必然需要具体现象的分析以做支撑。因此，本书的下编则立足于具体的诗歌诗潮和诗人，做以具象的论述。这一编，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的。在诗潮上选择的是新月诗歌、1949—1979年的汉语新诗、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在诗人及其作品上选择的则是胡适的《尝试集》、杨炼的诗歌和张曙光的诗歌。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从诗潮上说，这四种诗潮代表的几乎都是汉语新诗每个发展阶段的一次独特的话语形式。新月诗歌是对汉语新诗萌生后乱象的第一次纲领性的梳理，从解构到建构，自然值得关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的30年，诗歌呈现出的“空前绝后”的景象令人乍舌，深入分析之，能为汉语新诗的某种价值取向提供支持。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共同组成了80年代汉语新诗的全民狂欢，其中所蕴含的各种社会文化的交织，甚至已经超越了诗歌的范畴，这对于从话语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汉语新诗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不二选择。胡适的《尝试集》是汉语新诗的开山，